

分析型语言与隐性语义实化

——以景颇语、哈尼语为例

戴 庆 厦

[摘要]本文以藏缅语族的景颇语、哈尼语为例，通过对“宾谓同形”“泛义动词”“反响型量词”的实例分析来论述隐性语义如何浮现并实化，认为“隐性语义实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经济性原则，它能使同一个音节同一个词表示多种不同的意义，能使隐性义浮现为实义，还认为语序固定、词类兼用、程式化结构，是隐性语义实化得以顺利植根的内部机制。

[关键词] 分析型语言 经济性原则 隐性语义 实义化

一 题 解

语言的功用主要是表达、交流思想，每种语言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尽量发挥表义功能，力求表达更多的意义。由于世界语言的形态类型不同，如屈折型、粘着型、分析型等，语言功能的发挥必然会因为语言形态类型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特点。因此，认识语言功能的强弱及表达特点必须要有语言类型学的眼光。

汉藏语系语言大都属于分析型语言，而且分析性的强弱各不相同，存在不同的类型差异。如何根据自身分析性特点，以及分析性强弱不同的特点，增强表义功能，尽可能地表达更多、更复杂的意义，这是语言研究必须认识的问题。分析型语言扩大表义的手段很多，目前已认识到的语法手段有单音节词构词、重叠形式、韵律变化、义项扩大、词类兼用等（戴庆厦、闻静 2017）。此外，还有一个需要认识的手段是：如何通过分析性的手段将隐性语义实化，即使用较少的音节表达更多的意义。

所谓隐性语义实化，是指常用词中有些词单独没有意义或意义不明确，但进入特定的句法结构后，由于受到上下文的制约而发生实化，浮现出所需要的实在语义。也就是说，某一词汇形式单独没有意义，但进入句法结构后才有实际意义，用有限的音节表达更多的意义。这就是单音节性的分析型语言为了扩大表义功能，而采取的一种表达手段（戴庆厦 2020）。

先举个景颇语的例子来说明。景颇语的动词中有一类泛义动词，具有泛义性，单独出现时语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在具体的句子中能够根据上下文的条件浮现出多个具体的语义（戴庆厦 2020）。如泛义动词^①ti³³的用法^①：

^① 本文注释的缩略语代指：谓=谓语，貌=貌词，句尾=句尾词，语气=语气词，叠=重叠，量=量词，泛=泛义动词。

- (1) *joŋ³¹khɔŋut³¹ kau⁵⁵sai³³, khum³¹ti³³ u²³¹!* 都洗掉了，你别洗了！
都 洗 掉 句尾 别 洗 泛 句尾
- (2) *kǎ³¹lo³³ŋut⁵⁵sai³³, khum³¹ti³³ u²³¹!* 做完了，你别做了！
做 完 句尾 别 做 泛 句尾
- (3) *pǎ³³lor³³ ſin³¹khum³¹ ti³³ u²³¹!* 衣服你别这样洗（或折、放等）！
衣服 这样 别 洗 泛 句尾

例(1)-(3)的*ti³³*，单独出现时意义都不清楚，但在句中有了实义，例(1)是“洗”，例(2)是“做”，例(3)有“洗、折、放”等多种语义可选择。

可以认为，隐性意义实化是分析性语言依靠句法结构增强表达能力的一种手段。分析性语言，由于缺乏形态变化，加上单音节性，音节少，要表达更多的语义就需要从自身特点中挖掘潜力，扩大表义功能，而采用隐性意义实化就是一种最为简便而又符合分析性特点的手段。所以，许多分析性语言都程度不同地采用这一手段来增强表义功能（戴庆厦 2020）。

藏缅语族语言存在分析性强、弱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势必影响、制约隐性语义实化的特点和演变。本文选取景颇语、哈尼语^①这两种分析性强、弱有明显差异的语言为代表，对藏缅语分析型语言的隐性语义实化的特点进行描写、分析。景颇语属于藏缅语族景颇语支，在语言类型上属于具有屈折性特点的分析性语言，是藏缅语族中分析性特点居中的语言。与彝语支语言相比，景颇语的屈折性特点保留得相对多些；而与藏语支、羌语支的语言相比，屈折性特点消失得相对多些。哈尼语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是藏缅语族中分析性强的语言，保留形态变化较少，其分析性特点能够代表彝语支、缅语支等的语言。

二 隐性语义实化的实例分析

隐性语义实化的实例表现很多，有待不断挖掘、整理。以下从景颇语和哈尼语中提取三个例证来分析、说明。

（一）宾谓同形隐性语义的实化

宾谓同形，是指谓语使用宾语成分的形式构成的结构。从语义上看，泛义动词谓语单独出现时没有明确的意义，只有隐性意义；但在宾谓同形结构中能根据宾语成分的意义使泛义动词浮出具体的显性意义。宾谓同形，是分析性藏缅语扩大语义能力的一种较为能产的句法结构。藏缅语族许多语言，如普米语、彝语、傈僳语、拉祜语、载瓦语、浪速语、勒期语等都有这种句法结构。

宾谓同形的方式，因音节数量的多少而不同。名词是单音节的，取整个音节，如：景颇语的*ka³¹*（话）*ka³¹*（说）“说话”；哈尼语的*bw⁵⁵*（脓）*bw⁵⁵*（长）“长脓”。名词是双音节的，谓语取名词的最后一音节，如：景颇语的*n⁵⁵phje⁵¹*（挎包）*phje⁵¹*（挎）“挎挎包”；哈尼语的*u³¹tsho³¹*（帽子）*tsho³¹*（戴）“戴帽子”。由于藏缅语的名词大多是双音节的，谓语均取单音节，所以，宾谓同形的音节构成模式大多是：2+1=3^②。

宾谓同形结构能成为藏缅语常用的一种语法结构，是由藏缅语宾谓结构的组合特点以及

^① 景颇语以云南省盈江县铜壁关区的景颇话（戴庆厦 2012）为例；哈尼语以云南省绿春县大寨哈尼话（李泽然 2001）为例。

^② 为了语音长短和谐，这一模式的单音节谓语在读音上会读得长些。

宾语的特点决定的。藏缅语宾谓结构的种类与其亲属语言相比相对简单，宾语主要由动作行为涉及的对象和动作行为的结果的词汇充当，所以谓语在宾谓同形结构中，容易从隐性义中确定其显性义。如果宾语的种类复杂、多样，在宾谓同形结构中提取谓语显性义要在宾语的多种语义中选择一个时，就会出现难以确定的困难。

宾语是动作行为的对象时，作为泛义动词谓语取双音节名词的最后一音节。例如：

景颇语:	$tin^{31}je^{55}je^{55}$	扫地	$kjep^{31}tin^{33}tin^{33}$	穿鞋
	地 扫 _谓		鞋 穿 _谓	
哈尼语:	$se^{31}nq^{33}nq^{33}$	穿鞋	$ly^{31}xy^{33}xy^{33}$	戴斗笠
	鞋 穿 _谓		斗笠 戴 _谓	

宾语是动作行为的结果时，作为泛义动词谓语可直接用单音节名词，也可取双音节名词的最后一音节。例如：

景颇语:	$khu^{33}khu^{33}$	打洞	$mǎ^{31}khʒi^{?31}khʒi^{?31}$	编辫子
	洞 打 _谓		辫子 编 _谓	
哈尼语:	$a^{55}pa^{31}pa^{31}$	长叶子	$o^{31}tche^{55}tche^{55}$	腌酸菜
	叶子 长 _谓		酸菜 腌 _谓	

从来源上看，宾谓同形结构的出现是有先后层次的，大多数是通过句法的类推作用不断扩大范围的。藏缅语的谓宾同形结构出现后，靠类推不断扩大量，增强其表达能力，即便是近现代的外来词也能构成宾谓同形结构（戴庆厦 2020）。例如：

景颇语:	$se^{33}se^{33}$	办社（借汉语）	$n^{31}tsəŋ^{33}tsəŋ^{33}$	当长工（借傣语）
	社 办 _谓		长工 当 _谓	
哈尼语:	$thu^{31}xɔ^{55}xɔ^{55}$	画画（借汉语）	$sɔ^{31}tsɿ^{31}sɔ^{31}$	刷刷子（借汉语）
	图画 画 _谓		刷子 刷 _谓	

但有一点要说明。在宾谓同形结构中，宾语和谓语的结合度存在紧松的差异，有的紧些，有的松些；而松紧的差异受制于谓语语义的虚实，结合紧的，隐性义强些，结合松的，隐性义弱些。由此，可以把景颇语、哈尼语的宾谓同形结构分为松式宾谓同形结构和紧式宾谓同形结构两类。紧式的同形结构，谓语成分纯粹是宾语成分的复制，单独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宾谓同形结构中通过宾语成分的意义的映射才浮现出谓语的实义。如：景颇语的 $tsip^{55}$ （窝） $tsip^{55}$ （做_谓）“做窝”， $khin^{31}tan^{55}$ （纽扣） tan^{55} （扣_谓）“扣纽扣”。这类结构的宾语中有单音节词，也有双音节单纯词；双音节是单纯词，或前或后一音节没有意义。松式的同形结构，谓语来自合成名词宾语的最后一音节，有具体的语义。如：景颇语的 $tu^{31}pat^{31}$ （围脖） pat^{31} （围_谓）“围围脖”，其中， pat^{31} “围”来自 $tu^{31}pat^{31}$ “围脖”的最后一音节，该成分充当谓语用时，意义相同。不过，有的宾谓同形中的谓语成分，虽然取自合成名词宾语的最后一音节，且充当谓语用时，意义与合成名词的后一音节有关，但是存在差异。如：景颇语的 $khʒan^{31}khʒi^{33}$ （酸菜） $khʒi^{33}$ （腌_谓）“腌酸菜”中的 $khʒan^{31}khʒi^{33}$ “酸菜”由 $khʒan^{31}$ “菜”和 $khʒi^{33}$ “酸”两个语素组成，动词谓语 $khʒi^{33}$ “腌”取自 $khʒan^{31}khʒi^{33}$ “酸菜”的最后一音节 $khʒi^{33}$ “酸”，二者意义有关系但不同，一个是“酸”，一个是“腌”，“酸”是“腌”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宾谓同形结构的谓语取自宾语的最后一音节是纯粹的音节拷贝，而不完全考虑语义因素。

宾谓同形结构能够形成隐性语义实化的，与宾语接受谓语的范围较窄有关。景颇语、哈尼语容易形成隐性语义实化的，宾语多是接受谓语数量有限的，或是能够接受的多个谓语中

有一个谓语使用频率高。这个条件使得语言使用中，容易确定用什么实义来代替隐性义。如：景颇语的“饭”，能与许多谓语组成“吃饭、煮饭、蒸饭、做饭、买饭”等宾谓结构，“地”也能组成“种地、犁地、翻地、锄地、买地”等宾谓结构，由于选择范围大，所以不用来构成宾谓同形结构。但是，*tin³¹je⁵⁵*“地（面）”组成宾谓结构时，主要是与“扫”结合，所以能构成宾谓同形结构*tin³¹je⁵⁵je⁵⁵*“扫地”。又如：景颇语的*soi³³wa³³*“舂米歌”组成宾谓结构时，主要是与*wa³³*“唱”结合，构成宾谓同形结构*soi³³wa³³wa³³*“唱舂米歌”，而很少与别的动词组合。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名词宾语虽然可与多个动词谓语组合，但所组合的动词中有一个是最常用的，其他动词很少使用，于是最常用的词的语义就被同形谓语所选择，而不常用的词的语义就用别的动词谓语表达。如：*lā³¹khon⁵⁵*“手镯”一词组成宾谓结构时，主要用于“戴手镯”义，但它还可以与别的动词谓语组成“制作手镯、购买手镯”等，于是最常用的“戴手镯”就用宾谓同形结构表达，说成*lā³¹khon⁵⁵khon⁵⁵*，其他结构就用别的动词谓语。又如景颇语（戴庆厦 2020）：

<i>pur³¹khum⁵⁵khum⁵⁵</i>	枕枕头	<i>punj³¹khum⁵⁵kǎ³¹lo³³</i>	制枕头
枕头	枕 _谓	枕头	做
<i>khin³¹taŋ⁵⁵taŋ⁵⁵</i>	扣纽扣	<i>khin³¹taŋ⁵⁵mǎ³¹zi³³</i>	买纽扣
纽扣	扣 _谓	纽扣	买
<i>kjep³¹tin³³tin³³</i>	穿鞋	<i>kjep³¹tin³³mǎ³¹zi³³</i>	买鞋
鞋	穿 _谓	鞋	买

藏缅语中，宾谓同形谓语出现的频率受分析性强弱的制约。一般是，分析性强的语言，如哈尼语、载瓦语等的宾谓同形比较发达，出现数量多；而屈折和黏附形态成分比较丰富的语言，如羌语、普米语等的宾谓同形不太发达，出现数量少；景颇语介于二者之间。这证明，藏缅语族语言的宾谓同形结构中谓语隐性语义实化，确实与分析型语言存在密切关系（戴庆厦 2020:25）。

（二）泛义动词隐性语义的实化

景颇语动词中有一类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泛义动词。这类词在语用中也存在隐性语义实化的现象。所谓“泛义动词”，是指这类动词单独出现时，没有具体的意义，但在语用中，能够根据语境或上下文的需要，显示出某一具体的意义。就是说，泛义动词具有内在的实化潜力，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示不同的具体意义。景颇语的泛义动词有4个，分述如下。

1. *ʒai³¹*和*ti³³*：表示与人的四肢有关的各种动作行为。它们入句时，可选择的义项有“干、做、搞、办、拿、摸、变、成、装……”等。二者的差别是：*ʒai³¹*强调动作行为是自身发生、变化的，不在乎是否触及另一事物；而*ti³³*强调动作行为的发生、变化是触及另一事物的。二者都可以带宾语，也可以不带。所以，*ʒai³¹*和*ti³³*的区别主要是语义上的及物不及物。先比较景颇语的下面两个句子：

- (4) *sǎ⁵⁵pjin⁵¹si³¹khje³³khje³³ ʒai³¹wa³¹sai³³.* 柿子变成红红的了。
 柿子 红叠 变 泛 貌 句尾
- (5) *jon³¹a³¹sep³¹kau⁵⁵se?⁵⁵ai³³, naŋ³³khum³¹ti³³ lu³³!* 我都削了，你不要削！
 都 削 掉 句尾 你 别 削 泛 语气

例(4)的*ʒai³¹*在句中由于跟在“红”的后面，选择了“变”义，表示“柿子”是自身变红的，是不及物的。例(5)的*ti³³*用于*a³¹sep³¹*“削”的后一分句，选择了相同的“削”义，

虽隐含着宾语，但不出现宾语，也是不及物。

2. **ŋa³³和ŋu⁵⁵**：表示与言说、心理活动有关的动作行为。它们入句时，可选择的义项有“说、讲、唱、叫、想、感到、觉得、觉察……”等。二者的差别是：**ŋa³³**强调动作行为自身的发生、变化不触及另一事物；而**ŋu⁵⁵**强调动作行为的发生、变化触及另一事物。二者都可以带宾语，但也可以不带。所以，**ŋa³³**和**ŋu⁵⁵**的区别，同样也是语义上的及物、不及物，而不是句法结构上的及物、不及物。例如：

(6) ſi³³ kǎ³¹ niŋ³¹ ŋa³³ a³¹ ni⁵¹? 他怎么说（想）的？

他 怎么 说/想 泛 句尾

(7) kǎ³¹ niŋ³¹ ŋu⁵⁵ a³¹ ni⁵¹? 他怎么告诉他的？

他 怎么 说/告诉 泛 句尾

这两句的基本意义相同，都是“他怎么说（想）的？”。区别在于：说前一句时，说话者心目中强调的是“他说（想）”，而后一句除了表示“他说（告诉）”外，还强调“对谁说（告诉谁）”。泛义动词根据语境具体选择了“说（想）”“告诉”的实义。

人类的动作行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与四肢有关的，是看得见的；另一类是与言说、心理有关的，是看不见的。景颇语的4个泛义动词包括了这两类，有了这两类就能基本满足景颇族人民日常交际中表达动作行为的需要。

泛义动词在景颇语句法结构中的用法有三种：一是泛义动词前加否定副词构成谓语，如例(8)的泛义动词**ŋa³³**与否定副词**khum³¹“别”**一起作谓语，非否定的谓语不成句。二是泛义动词前加方式状语构成谓语，如例(9)。这类句子出现频率较高，这是因为泛义动词的语义宽泛，需要有状语的限制，才能使其意义具体化。三是泛义动词前加状语、后加表示具体意义的实义动词构成谓语，如例(10)-(12)。泛指动词在例(10)中当“变”义用，在例(11)中当“动”义用，在例(12)中当“成”义用。例如：

(8) naŋ³³ khum³¹ ŋa³³ u?³¹! 你别说了吧！

你 别 说 泛 句尾

(9) ſi³³ kǎ³¹ niŋ³¹ ŋa³³ a³¹ ni⁵¹? 他怎么说（想）的？

他 怎么 说/想 泛 句尾

(10) pǎ³³ lon³³ phʒo³¹ phʒo³¹ ʒai³¹ sai³³. 衣服变得白白的了。

衣服 白 叠 变 泛 句尾

(11) phʒan³³ ʒai³¹ pai⁵⁵ wa³¹ mat³¹ sai³³. 迅速地又回去了。

迅速 状 动 泛 又 回 貌 句尾

(12) kap⁵⁵ kap⁵⁵ ti³³ mǎ³¹ kap³¹ ton³¹ u?³¹! 你牢牢地贴上吧！

牢 状 成 泛 贴 上 句尾

泛义动词用在状语后，在它的后面还带有实义动词的句子，容易出现语法化，成为状语的标记。如例(11)的**ʒai³¹**，动词的意义已很弱，已经弱化为**phʒan³³“迅速状”**的标记。在母语人的语感中，已辨不出它是个动词，而当成是一个虚义词。

泛义动词是分析型语言的产物。分析性语言由于单音节性词是词汇的核心，要表达更多的意义，必须扩大词的表义功能，尽量能多表示几个义项。而泛义动词能够演化为多个动词，正是由分析性的特点决定的。

(三) 反响型量词隐性语义的实化

藏缅语族许多语言有反响型量词，能共同出现这一类量词与都有分析性特点有关，也跟量词不发达有关。反响型量词，又称“临时量词”“拷贝量词”，是临时借用名词当量词使用。它单独没有意义，只有与名词、数词结合时，才具有表示某一名词具体量的意义。如哈尼语的“一个哥哥”说成 $a^{55}go^{33}$ （哥哥） $t\chi hi^{31}$ （一） go^{33} （个量）。 go^{33} 是借用名词 $a^{55}go^{33}$ “哥哥”的后一音节，单独没有意义，与 $a^{55}go^{33}$ “哥哥”结合后才有“个（哥哥）”的意义。

反响型量词使用频率较高，但不同语言的使用频率存在差异。在笔者调查过的20多种藏缅语里，绿春哈尼语的反响型量词分布最广，功能最大，几乎所有的个体名词都能使用反响型量词来表名词的量。例如：

$tsho^{55}t\chi hi^{31}tsho^{55}$	一个人	$za^{31}mi^{31}ni^{31}mi^{31}$	一个女孩
人 一 个量		女孩 两 个量	
$mja^{33}t\chi hi^{31}mja^{33}$	一只眼	$na^{31}bo^{55}ni^{31}bo^{55}$	两个耳朵
眼 一 只量		耳朵 两 个量	
$a^{31}khu^{31}t\chi hi^{31}khu^{31}$	一只狗	$a^{31}ya^{31}ni^{31}ya^{31}$	两只猪
狗 一 只量		猪 两 只量	
$a^{55}si^{31}t\chi hi^{31}si^{31}$	一个水果	$a^{31}me^{55}ja^{31}me^{55}$	五个核桃
水果 一 个量		核桃 五 个量	
$phe^{55}x\omega^{31}ku^{31}x\omega^{31}$	六件衣服	$la^{31}tsho^{31}s\omega^{55}tsho^{31}$	一条裤子
衣服 六 件量		裤子 三 条量	
$la^{31}x\omega^{55}ni^{31}x\omega^{55}$	两间房子	$ya^{31}ku^{33}t\chi hi^{31}ku^{33}$	一个猪圈
房子 两 间量		猪圈 一 个量	
$tho^{33}d\omega^{55}t\chi hi^{31}d\omega^{55}$	一把刀	$bu^{31}za^{31}ni^{31}za^{31}$	两个坛子
刀 一 把量		坛子 两 个量	

反响型量词与其他量词，如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等不同，在量名结构中主要充当量词的语法功能，即填补量词的位置和对名词进行指称。但如果要表示具体的量词语义，也可以换用含有性质性状意义的个体量词和通用量词。例如哈尼语：

$mja^{33}t\chi hi^{31}mja^{33}$	一只眼	也说	$mja^{33}t\chi hi^{31}nu^{33}$ (nu^{33} 表粒小状)
眼 一 只量			眼 一 只
$phe^{55}x\omega^{31}ku^{31}x\omega^{31}$	六件衣	也说	$phe^{55}x\omega^{31}ku^{31}cu^{33}$ (cu^{33} 表衣裤状)
衣服 六 只量			衣服 六 件
$ja^{31}de^{55}t\chi hi^{31}de^{55}$	一条鱼	也说	$ja^{31}de^{55}t\chi hi^{31}za^{31}$ (za^{31} 表小状)
鱼 一 条量			鱼 一 条
$a^{31}nu^{31}t\chi hi^{31}nu^{31}$	一头牛	也说	$a^{31}nu^{31}t\chi hi^{31}kho^{55}$ (kho^{55} 表块状)
牛 一 头量			牛 一 头
$d\omega^{33}ya^{31}ni^{31}ya^{31}$	一根草	也说	$d\omega^{33}ya^{31}ni^{31}mo^{55}$ (mo^{55} 通用)
草 两 根量			草 两 根
$xa^{31}la^{31}s\omega^{31}la^{31}$	三只虎	也说	$xa^{31}la^{31}s\omega^{31}mo^{55}$ (mo^{55} 通用)
虎 三 只量			虎 三 只

从上举例子可见，反响型量词单独出现缺少词汇义，在量名结构中才有量词语义，但也

只有笼统的量词语义，不区分细致的量词语义。在藏缅语族中，都普遍出现表示性质性状、通用的量词，量词语义有了细化或实化，这是名量词为了指称的需要增加功能。

藏缅语族语言个体量词发展不平衡。有的语言还处在量词发展的萌芽阶段或不发达阶段，表示个体量时个体量词可以不用。所以在这类语言里，量名结构有两类形式，一类是要用个体量词，另一类是不用个体量词。用不用个体量词，意义都一样。如：景颇语的phun⁵⁵（树）lǎ⁵⁵ŋai⁵¹（一）“一（棵）树”和phun⁵⁵（树）n³¹phaŋ³³（棵）lǎ⁵⁵ŋai⁵¹（一）“一棵树”，意义一样。这也说明反响型量词的出现，主要不是语义表达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句法结构（填补量词的位置）的需要。从藏缅语族的情况看，凡有反响型量词的语言，表名词的数量时，量词在句法结构中是强制出现的。

三 隐性语义实化的成因

任何一种语言现象的形成都不会是由孤立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都有其多种制约的因素或动力。当然，在多种形成因素中，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戴庆厦 2020）。

1. 藏缅语族的景颇语、哈尼语等能够产生“隐性语义实化”现象，主要动力是词汇的单音节性，与之相关的是缺少形态。词汇单音节性的语言，如果仅凭单音节词来表义是远远不够的，势必要在单音节词的基础上采取可能的手段进行创新，以达到表达更多意义的目的，而隐性语义实化是一种可选择的手段。

2. 经济性原则是产生隐性语义实化手段的动力。语言表达都讲究经济性原则，要求尽可能使用较少的语言材料表达更多的意义。经济性原则策略的使用，不同类型的语言会有所不同，即不同类型的语言会出现不同的特点。词汇单音节性语言，能用同一个单音节词依靠特定的语境或结构形式，表示更多不同的意义。

3.“隐性语义实化”现象的形成与景颇语、哈尼语等的词的音节分布特点有关。景颇语、哈尼语的名词以双音节词为多，而动词则以单音节为多。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表2：

表1 景颇语、哈尼语名词的音节数统计

语言	统计数	单音节数	比例	双音节数	比例	三音节及以上	比例
景颇语	997	180	18%	615	62%	202	20%
哈尼语	796	72	9%	606	76%	118	15%

表2 景颇语、哈尼语动词的音节数统计

语言	统计数	单音节数	比例	双音节数	比例	三音节及以上	比例
景颇语	801	407	51%	346	43%	48	6%
哈尼语	697	436	63%	181	26%	80	11%

双音节加单音节的音节“2+1=3”匹配模式是一种韵律模式，这种韵律模式为景颇语、哈尼语等实现隐性语义实化提供了条件。

4. 语序固定是隐性语义实化得以顺利植根的内部机制之一。语序固定，容易形成各种程式化结构，而程式化结构能帮助语言使用者程式化套用语义结构。

参考文献

- [1] 戴庆厦. 2012.《景颇语参考语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戴庆厦. 2020.《论分析型语言研究法的构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
- [3] 戴庆厦、闻 静. 2017.《论“分析性语言”研究眼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 [4] 李泽然. 2001.《哈尼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Analytical Languages and Instantiation of Implicit Meaning: A Case Study of the Jingpo and Hani Languages

DAI Qingxi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implicit meanings emerge and instantiate in examples of the isomorphic object-predicate constructions, the general verbs and the echo classifiers in Jingpo and Hani, tw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t proposes that the leading characteristic of “implicit meaning instantiation” l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nguistic economy principle so that multiple meanings can be expressed via one and the same syllable or word and concrete meanings can emerge from the instantiation of implicit meanings. It also holds that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implicit meaning instantiation depends on such intrinsic mechanisms as fixed word order, words with multiple-category membership and formulaic constructions.

[Keywords] analytical languages the economy principle implicit meaning semantic instantiation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